

(更)公平的全球史

EUI 全球史研讨课小组*

欧洲大学研究院，佛罗伦萨

2020 年秋天，欧洲大学研究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的一群博士研究生和两位导师定期聚在一起，共同参与全球史研讨课程。大家并不能总是相聚于同一个空间，有时候通过视频的小框我们看到彼此置身于起居室、卧室或厨房。我们之间的联系时而因互联网的不堪重负发生中断。不定期的封锁和隔离举措下，我们无法见面，无法握手，无法与朋友和家庭团聚。在这样一个空前遥远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讨论全球史呢？

研讨课催生了二十个人之间的对话，有年长者也有青年，有信徒也有无信仰者。大家聚合于全球史这个话题之下，在 10 个为时 2 小时的研讨会中，阅读并讨论了全球史领域的各种文本。我们的讨论从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杰里米·阿德尔曼（Jerry Adelman）和马克辛·伯格（Maxine Berg）¹ 等人最新的重要论述开始 然后转向“微观全球史”、“分流”、“空间”、“数字公共史学”和奴隶制等话题。（如果对讨论涉及的阅读内容感兴趣，可以在欧洲大学研究院网站上获得更多相关信息）。²

* Friedrich Ammermann (Germany), Paul Barrett (Ireland), Olga Byrska (Poland), Elisa Chazal (France), Vigdis Andrea Baugstø Evang (Norway), Eoghan Christopher Hussey (Ireland), Carlos Jorge Martins (Portugal), Roberto Larrañaga Domínguez (Spain), Fartun Mohamed (Italy), Sven Mörsdorf (Germany), Bastiaan Nugteren (The Netherlands), Anna Orinsky (Germany), Rebecca Orr (United Kingdom), Cosimo Pantaleoni (France), Lucy Riall (Ireland), Giorgio Riello (Italy and United Kingdom), Asensio Robles Lopez (Spain), Alejandro Salamanca Rodríguez (Spain), Liu Shi (China), Takuya Shimada (Japan), Halit Simen (Turkey).

¹ SEBASTIAN CONRAD, *What is Glob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MAXINE BERG, 'Global History: Approaches and New Directions' and 'Panel Discussion: Ways Forward and Major Challenges', in MAXINE BERG, ed., *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Global: Challeng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Published for The British Academy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18, 197–208; JEREMY ADELMAN, 'What is Global History Now?' *Aeon*, Essays, March 2, 2017, <https://aeon.co/essays/is-global-history-still-possible-or-has-it-had-its-moment>.

²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Research & Teaching, Seminars, 2020-2021 1st term, Global History, Accessed January 31, 2021, <https://www.eui.eu/DepartmentsAndCentres/HistoryAndCivilization/ResearchAndTeaching/Seminars/2020-2021-1st-term/DS-Global-History-RiallRiello>.

这些讨论反映了全球史话题的活力和最新动向。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假设没有任何先验的专业知识；确实，只有少数研讨课成员可以被明确称为“全球史学者”我们大多数人，包括老师在内，都在寻求可以纳入全球史研究的不同方法。我们对全球史的方法和问题感兴趣，通过并置不同时空和比较不同的方法论，有意识地挑战区域研究的边界。我们了解到在过去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全球史研究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至今仍在持续。关于全球史，并没有统一标准：事实上，自 2009 年 EUI 全球史研讨课开设以来，课程内容已经改头换面，以至于 2020 年的教学大纲中没有出现任何 2009 年教学大纲曾出现过的内容。³

研讨课的两位导师露西·里尔（Lucy Riall）和乔吉奥·列略（Giorgio Riello）根据大家的讨论提出一系列问题，博士研究生们分别阐述自己的看法。我们收集了这些回答，并在研讨课上进行讨论，然后才有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经过整合和修订的文字版本。博士研究生和老师们的集体合作，不仅试图捕捉全球史的轮廓，同时反映了我们对全球史是什么，和它未来可能或应该呈现的面貌的思考。我们提出让我们困惑和愤怒的问题。大家共同完成这件事情说明全球史不能以隔绝的状态进行，也许我们在近来的光景中感觉孤单，但是学术探索之路不会孤身只影。

感谢 *Cromohs*（*Cyber Review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为我们提供的机会。我们主要探讨了三个主题：“全球史的政治”将全球史视为一种行动主义的方式；“谁的全球史？”讨论所有权和共享问题；“开放的全球史”（针对目前的困境）提出了乌托邦式的未来设想。

全球史的政治

全球史曾被视为解决长期以来历史学危机的方案，但它却被证明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答案，而且肯定不是针对“历史疾病”的灵丹妙药。近来关于全球史的讨论（有的已经在此杂志上发表文章）并不诱导任何正在考虑从事历史专业的人，或者让任何人成为全球史的实践者。这种排外感源于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中心和边缘。全球史学家对沃勒斯坦式的核心和边缘模型不屑一顾，

³ 欧洲大学研究院历史系历年研讨课与教学信息见：<https://www.eui.eu/DepartmentsAndCentres/HistoryAndCivilization/ResearchAndTeaching/Seminars/Past-Seminars>.

但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一遍又一遍地复制这些模型。他们的学术成就正如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作为一群年轻的历史学家，我们可以思考自己是否处于“学术边缘”。我们可能从事历史研究，找到一份工作，甚至完成学位论文。我们是条件优越（即便预算削减）的西方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并不属于学术边缘，尽管它的所在地佛罗伦萨在文艺复兴时期比现在更接近于“全球枢纽”。

两个月的全球史的阅读和讨论让我们所有人都充满了“苦涩味”（*l'amaro in bocca*），它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竞争而非合作，是固守而非包容，统领地位不仅体现在学术作品上，也体现于全球史的学术讨论中。学术界可能是一个令人生厌的地方，尤其是在权威机构中。众所周知，竞争成为近来学术生涯的主调（出版或淘汰；基金；H 指数）。一些（当然不是全部）有建树的研究者努力建造了自己的象牙塔。在这样的领地上，他们可以安全地发出声音。这些人和机构已然成为全球史的中心，充当着广播员的角色。

历史学的新趋势并非都发生于英语世界。“文化史”（*Histoire culturelle*），“微观史”（*Microstoria*）和“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以及全球史都诞生于在英语文化圈之外。但是目前的事实是，除非受到英语文化中心和其所在的出版社的认可和接纳，否则新的史学潮流不会成为“全球”现象。与此同时，将“全球”和“英语圈”，“欧洲”和其西北角进行对标，无疑强化了对于欧洲历史的过时看法，它使我们想起了 19 世纪的学术传统而非 21 世纪。如今全球史正沿着相似的道路走向跨国领域，这一传统视角尤其令人失望，因为它背离了其建立时的初衷，即去中心化叙事和让“底层发声”⁴。全球史吸收了当今英语时代的“时代精神”而成为全球化现象。

这些事实让人感到难以接受，因为正是全球史具有的解放的潜力（追踪边缘参与者或重读传统的民族国家叙事）才使得这么多人对此感到兴趣盎然。因此，如果全球史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全球化的现状，那么它也可以表明，

⁴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Laura Chrisman and Patrick Williams,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66-111.

现在的全球化的世界和其呈现的形状并非是给定的结果，今天的我们也可以像过去的参与者那样塑造我们的世界。

我们不认为全球史是“一部所有人的历史”，也不寻求建立新的宏大叙事。相反，我们认为全球史更需要这样的观点：宏观概览让位于更具深度的视角，这种视角不只是对本地或国家感兴趣，而是希望为解释全球现象提供新的框架。它利用本地知识和本地的学术研究，建立既富见识又具洞察力的全球叙事。这项工作现在仍是欧洲和更广泛的西方世界最常进行的工作，世界的其他地区 and 学术团体同样可以如此。我们认为，从边缘处书写的全球史将推动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交流。这不仅是愿望，它可以而且只能通过行动来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全球史必须竭力解决不平等现象，让欧美以外的历史学家能决定研究视角和分析是否范围适当，合体得宜和成果显著。

如果我们要向更资深的全球史学家提出建议，那就是去建立一个真正的多元和多语言的学术网络，让更多的学者感到自己可以有所贡献。这样做意味着承认国际学术界现有的结构存在统治和压迫的等级制度，反过来促使我们思考致力于知识创造的学术机构之间，和为这些机构提供资金和支持的国家与社会，全球和本地的之间的不平等问题。

权力无处不在，而且分布不均。然而，有些权力形式甚至尚未被意识到。在系列研讨课中，我们讨论了语言的作用，尤其是英语的作用。我们所有的阅读材料都是英文；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提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如果英语不是学术界的国际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那么现有的知识生产体系会怎样？全球史将呈现什么面貌？全球史学家马丁·杜辛伯雷（Martin Dusinberre）试图唤起对当地语言的重视，他将其视为叙事者和参与者的核心，这一点在宏大叙事中往往被忽略。⁵他发表在《历史研讨杂志》（*The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上文章让我们所有人直接面对原始语言的文献，以取代西方学术界的确定性。一篇日语文章可能比某些捕风捉影的英语文章更接近主题，即使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虽然不是所有人）而言难以理解。

⁵ MARTIN DUSINBERRE, 'Japan, Global History, and the Great Silence,'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83, no. 1 (2017): 130–50.

多种语言不仅有利于进入不同的文献，而且对切入不同的领域和视角有所助益。对不属于英语圈的历史学家来说尤其如此。与其将英语的全球史的书籍翻译成其他语言，不如将中文、日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法语的作品翻译成包括英语在内的多种语言，这就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出版，出版什么以及由谁出版。

最负盛名的出版商（仍是英国和美国的学术出版社和著名的商业出版商）追随全球史的学术浪潮，出版了由顶尖高校的知名学者（主要是男性）撰写的针对大众读者的历史读物。这样做的结果是再次巩固了已建立的等级制度，并抹杀全球史富有争议的潜力。全球史的主要期刊需要通过订阅才能获取，限制了对无法负担订阅费用的机构的影响。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发表的刊物，比如剑桥杂志《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还在于如果不开放文章的获取权限，那么条件有限的机构的学者就难以便捷地查阅。这样差距只会扩大。

也许全球史应该设置一个新的议程，形成一个包容多元声音的持续性论坛，它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让那些（也许仍然）未曾被听到并保持沉默的声音可以找到发声的地方。处于英语圈边缘的历史学家和写作者不仅应被纳入到全球史已有的讨论中，他们还能在建立新的问题与话题时享有权利。过去的一代女性历史学家就面对过这样的情况：在一个尚由男性主导的领域中，人们认识到女性在开辟全新的历史研究领域中的作用。全球史有责任推动新的重要转变以修正历史的兼容并包。也许全球史的议程应该包括“主动倾听”（proactive listening）。承认并重视普遍性差异，更广阔（但可能仍不完整！）的世界史才可能会找到发展的空间。

谁的全球史？

在一篇发人深思的在线文章中，杰里米·阿德尔曼提醒我们思考那些在全球史中被遗忘的人：有很多人不旅行，彼此没有联系，他们对于全球化的体验主要是由全球化的恶果带来的。⁶ 这些人可能不会像大学的教授那样对全球史充满同情。阿德尔曼关注的是美国“铁锈地带”（Rust Belt）的工人阶层，而不是尼日利亚的农民或江苏工厂的工人。在叙述全球史时，我们需要追问

⁶ DELMAN, 'What is Global History Now?'

这将是谁的历史？国别史对国家的建立有好有坏。他们塑造了一种民族身份（有时是民族主义），颂扬（或美化）国家机构和文化，并在历史叙事中营造一种使命感（和自我限制）。所有这些地方“坐标”很难在全球地图上全部得到绘制。认为全球史有助于创造“全球身份”或颂扬超国家机构或文化的观点并非高明。

为了回应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地方化欧洲”（Provincialize Europe）的呼吁，全球史有什么有效行动呢？⁷如今历史学家不再认为人们会被动接受在已确立的“中心”（例如西方）发展出来的观念。这种转变绝非轻而易举和水到渠成。全球史在特定学术背景下取得了成功的数年后，历史学家们试图拓宽他们的研究主题、地域范围、方法和研究视野。人们会认为，全球史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大众媒体塑造的西方公众舆论：它们都假装涵盖了遥远的地区，但在他们的叙述中，某些人（例如“伟人”）和某些地方远比其他人和其他地区更重要（整个国家甚至大洲都消失在背景中）。正如马克辛·伯格所说，欧洲从“认知主体”到“物的全球史”的转变过程中，只是从欧洲中心主义转向了“欧亚中心主义”。⁸将地球南部，包括非洲、伊比利亚美洲和（非盎格鲁）太平洋地区纳入全球史仍是挑战，部分原因在于学术等级制度会发挥隐性作用，将与自身不同的声音和方法排除在外。

因此，“不均”导致被排除的部分和试图纳入的部分旗鼓相当。这或许是全球史固有的局限性：在不遗余力地尝试囊括更广阔的地域和时间范围时，它不得不承认（过去和现在的）许多人不适合他们的叙述，他们的故事与地球上的 77 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没有关系。我们无需陷入寻求一种适合所有人的普遍历史的陷阱。如果在《全球史》十周的阅读之后想要获得一条箴言的话，那就是该领域是纷繁复杂的，杂乱无章的，有时是不悦耳和谐的。我们只能珍惜、重视和提升这些特点。试图为“全球史是什么”提供概括性答案不足以反映是谁撰写了这样的历史，以及他们在为谁书写。

⁷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⁸ BERG, 'Global History: Approaches and New Directions', 5.

如果一个人在新加坡的东南亚历史系写一部全球史会怎样呢？或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或利马的南美历史系开始写作全球史又会如何？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地方遍布了解地方语言的人，他们可能会带来与欧洲或北美的同行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再举一个例子：如果印度的知识分子开始拒绝欧洲优越性的全球叙事会怎样？当然，随着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兴起，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像在知识分子的成果中看到的那样，人们可能会期望全球史具有同样的分析和解构的意义（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相当一部分最终进入了常春藤盟校）。这也将导致更好地理解非欧洲参与者的能动性。

欧洲和西方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认为这些与他们无关。对于默认欧洲历史只能以欧洲为中心的人来说，如何获得（或者说是“调整”）欧洲霸权仍是一个问题。这一话题必然会影响全球史和帝国史，近年来，它也体现于陆地史和国别史中。我们在阅读中讨论了欧洲参与者在变化的全球环境、资源开发、景观改造和生态系统破坏中发挥的作用。这些话题引起了年轻学者的共鸣，也为 EUI 和其他地区的研究提供了信息。年轻学者们提出了有关能动性、主体性、权力以及人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等问题。他们还创造了不再是“我们与他们”，“西方与其他地区”的叙事，一种考虑了全球范围内的参与者、环境和机构之间复杂联系的新历史。

开放的全球史

20世纪中叶，法国年鉴学派的学者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曾试图改变历史学的主题、时空和分类方式。E. P. 汤普森 (E. P. Thompson) 在他的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的序言中写道：“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⁹ 然而，这种试图“从底层”书写以及将阶级的类别纳入到历史写作中的尝试，最终以很多人的边缘化而告终：女性，尤其是种族化的“底层”和“偏离”于标准的女性，以及那些主要

⁹ EDWARD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ed. (London: Gollancz, 1980), 12. (英) E.P. 汤普森,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 (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5 页。(译者注)。

身份不是由阶层划分的人群。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把重点放在阶级的能动性上，而将主体性降为次要角色；工人阶级男性的身份是由其社会地位决定的，而非他的自我认识。

我们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所有的线性叙事，包括历史叙事（“成因”），都是围绕核心主角和场景（无论是英雄、阶级、运动还是国家）构建而成，因此，任何试图从“后代的不屑一顾”中跳脱出来拯救过去的边缘人群的尝试都无可避免地会将其他人边缘化。这并不是说关注边缘人群或改变当前叙事方式徒劳无益（这正是年鉴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成就），而是要挑战“过去”和“后来”的线性叙事观念，对全球史来说尤其应该如此。在研讨课的讨论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回过头来强调主体体验的重要性，强调回到囊括次要主题和地域的“自下而上”的历史，强调回到一个关注多元声音而非仅仅关注发出最大声音的历史。同样，对主体性的强调意味着全球史学家之间需要具有一定程度的谦逊和反思，关于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以及我们对专业理解的局限性。

这并不是说历史研究的全球取向不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恰恰相反，对一门非常依赖经验、实践、共识和对书面语的共性认知的学科而言，多元的声音，多样性的主题和针锋相对的讨论，所有这些都既鼓舞人心又富于挑战。这些阅读迫使我们直面我们已有的特权，和我们作为西方宏大叙事的实践者和受益者的事实。我们认同全球史研究带来了集体性和普遍性的“纯真的丧失”。

我们从这些阅读和讨论中有什么收获？未来的全球史将如何实现其初衷和解放的潜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下面列出了部分研讨课成员的看法和意见：

- 更多关于女性和由女性书写的全球史。全球史关注不同人群和新的空间，但令人惊讶（或讽刺）的是这是一个如此男性化的领域。男性的声音和凝视倾向于在辩论中占主导地位，男性在全球史叙事中也更倾向于成为更引人注目的主角。也有一些杰出的全球女性的历史，但她们却与有关空间、联系和流动性等更广泛的讨论截然分离。

- 同样，强调跨国“联系”往往会给那些有时间和金钱建立联系的人们带来特权。除了一些特例（如艾米·斯坦利的日本“女仆”故事）以外，我们对那些与全球“脱节”的人，或待在家里的人的全球视野和经历知之甚少。¹⁰
- 知识构建的多进程。全球史具有极大的潜力来扩展对过去的人和现在的人们对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理解。这种历史具有环境意识，并考虑人类、自然、物质（资源、技术、工具、人工制品、消费品）和跨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
- 不止需要对欧洲去中心化。只是加入更多的区域并考察这些空间之间的联系是不够的。“欧亚中心主义”并不能解决仍然潜藏在全球史叙事中有关“进步”和“现代性”的分类问题，或存在和缺乏“进步”和“现代性”的分类问题（“分流”问题）。从尼日利亚人、秘鲁人或日本人的经验出发，用“相互比较”（Reciprocal comparisons）的方法考察欧洲历史问题可能会提供一条前进的道路。¹¹
- 需要从现在与过去之间的不同关系中寻求更复杂的叙事。我们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但历史学家可以寻找替代方案和转折点，并解释意外情况。基于 20 世纪的议题，全球史可以以“去民族化”的方式解释奴隶制历史。对奴隶制历史采取一种全球性策略将使奴隶制的具体情况置于美国历史背景中（至少将其历史扩展到加勒比地区）；我们可以探索奴隶制与种族之间的联系，一方面考察奴隶制之间的内部关系，另一方面讨论奴隶制与殖民地征服历史之间的联系。
- 我们在研讨会上阅读过的最出色或最具创新性的作品之一是有关早期现代全球史学的主题。将早期现代的定义延伸至 19 世纪对我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值得注意的是 20 世纪的全球史研究的国际性焦点议题，EUI 专门有一个研讨会讨论这一时期，即按照时间顺序分期的重要问题。当然，没什么比划分为中世纪、早期现代、现代等等更以欧洲为中心的了。这

¹⁰ AMY STANLEY, 'Maid-servants' Tales: Narrating Domestic and Global History in Eurasia, 1600–190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1, no. 2 (2016): 437–60.

¹¹ GARETH AUSTIN, 'Reciprocal Comparison and African History: Tackling Conceptual Eurocentrism in the Study of Africa's Economic Past,' *African Studies Review* 50, no. 3 (2007): 1–28.

种分期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同样适用吗？甚至它对于欧洲适用吗？瓦莱丽·汉森（Valerie Hansen）表明，如果我们以 1500 年的“地理大发现”作为“全球史”的起点，我们必然是以欧洲为中心；我们忽略了这样的想法：欧洲人在发现“新世界”时，只是延续了非欧洲人在几个世纪以前建立的路线。¹² 我们迫切需要批判性的思考欧洲“作为沉默的指涉者”的问题，同时还要质疑它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的问题。¹³

我们再次感谢 *Cromobs* 提供的这次机会，让我们能以集体成果的形式表达我们的观点。研讨课和教学受到 COVID-19 的巨大影响，如果我们在这一动荡时期对全球史面临的问题的经验和思考能够激发进一步的讨论，我们将不胜欢欣。*Cromobs* 对开放出版资源的做出的贡献让我们感到尤为振奋。只有通过自由和充分的学术思想交流和研究，我们才有希望推进这一激动人心的研究领。

翻译：石榴

¹² VALERIE HANSEN, *The Year 1000: When Explorers Connected the World and Globalization Began* (New York: Scribner, 2020).

¹³ CHAKRABARTY, *Provincialising Europe*, 28.